

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在 双重转换中的当代建构

□ 唐爱军

中共中央党校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91

一、从“革命”到“建设”的话语转换

唯物史观一经创立,马克思恩格斯就运用到对人类社会的分析中,最基本的观点呈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反思,以及关于资本主义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思考;二是对未来社会的原则规定和相关设想。客观地说,马克思恩格斯当年面对的“核心问题域”是无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等,一句话就是“革命”主题。基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话语被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转化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理论武器,并且实现了革命话语的中国化,建构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话语体系。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尤其是“过渡时期”的相关理论进一步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话语体系。

第一,建构“发展有效性”话语体系。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中国共产党对主流意识形态做出相应调适,在马克思主义的阐释重心与核心话语建构等方面有着相应的变革,其基本逻辑就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逐步建构适应中国国情的“发展有效性”话语体系,尤其是基于中国道路进行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

在马克思主义阐释及其话语建构上,邓小平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政治革命为核心到以生产力发展、社会革命为核心的阐释重心的转换。生产力标准构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建构的根本基础。“离开了生产力标准,用抽象原则和空想模式来裁判生活,只能败坏马克思主义的声誉。”以生产力标准为核心建构的一系列理论,都遵循了“发展有效性”的话语逻辑。以往,“革命”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核心要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将党的先进性建设与发展有效性关联起来。党的先进性不再仅仅维系于革命合法性,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更多地是由发展有效性来提供的。科学发展观更是

在更高层次上建构发展有效性的话语体系。党的十七大以来,我们党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整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这样“一篇大文章”框架中,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我们党有意识地基于中国道路进行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建构。一方面,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需要着眼于有效性原则,建构起能够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有效话语,指导中国道路的实践性拓展,即提供“改造世界”的话语。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建构要从“超越性话语”“理想性话语”走向“实效性话语”“世俗化话语”,直面“中国式现代化”、基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验,提供能够有效解释中国道路的话语体系,即提供“解释世界”的话语。离开了中国道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话语创新则失去现实生命力;离开了中国道路,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建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则丧失了中轴。

话语转换背后是意识形态的历史性变迁。贝尔指出,旧的意识形态走向了穷途末路,正在崛起的意识形态是以现代化、发展经济和民族利益为基本定向的。关于意识形态呈现的“发展有效性”趋势,用邹聿的话说,这代表了“意识形态再功能化”,即把意识形态与经济增长、现代化的功能要求联系起来。作为一种原初的“反资本主义现代性”方案,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要呈现出新的独特任务:要为中国提供现代性方案,要建构起有效解释中国现代性的话语体系。

第二,建构“执政合法性”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是“批判性”与“建构性”相统一的话语体系。在革命时期,基于当时的时代需要和社会现实,前者相对凸显,后者相对隐退。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中,我们应当将两种面向有机结合起来,更加凸显“建构性”功能:着眼于合法性原则,建构起

能够维护政治秩序和社会稳定的话语体系。马克思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冲突和社会不平等的解释模式：“阶级分析法”和“阶级两极化模式”。资本主义社会的冲突与不平等根源于资本与劳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与对立，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解决这一矛盾。这些革命话语并没有过时，仍然适用于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阶级关系的分析与考察。如何对待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利益差异、利益冲突和现实中的不平等？在某些方面，可能这些革命话语解释力式微了。建构“执政合法性”话语体系的根本特征是：着眼于“社会整合”，看待社会中的利益差异、利益冲突。一方面，执政党基于“和谐思维”，通过一系列话语建构和意识形态建设，引导民众正确地看待利益差异甚至是利益分化，避免形成对抗的、斗争的“阶级意识”。另一方面，执政党要正视马克思主义的公平正义的价值诉求与现实中不平等之间的“落差”，建构起能够有效解释社会转型期的“事实的不平等”的话语体系，至少要达成这样的话语解释效果：“事实的不平等”是非体制性的、非本质性的，并且是暂时的，甚至从现代化发展角度看，它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总之，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当代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建构上，应该更加凸显“改革发展稳定”“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共同富裕”“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族复兴”“核心价值观”等话语，要为辩护现存秩序提供“合法性话语”供给。

二、从“传统模式”到“中国特色”的话语转换

第一，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逻辑的话语建构。经典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或传统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对私有制、资本、市场等逻辑（统称为“市场经济逻辑”）是持彻底批判态度的，坚持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区分看作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一度停滞，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传统意识形态的禁锢。邓小平南方谈话推动了巨大的思想解放，主流意识形态做出了适时调整：将市场经济话语从“资本主义话语库”中剥离出来，承认并尊重市场经济逻辑。与传统社会主义观念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认个人的财产权，尊重不同利益之间的契约关系，逐步容忍和吸纳资本、市场、竞争、利益分化等话语，为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现代性逻辑在中国的扩张提供有限度的合法性支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也是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的重大成果。当然，我们也要充分意识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创新绝不是仅仅顺从市场经济逻辑，受其支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话语表述本身就意味着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对

市场经济逻辑持辩证态度。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建构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基于市场经济逻辑进行的“顺向”建构。所谓“顺向”建构就是将反映市场经济发展趋势、利于既有利益结构优化、体现市场经济正面价值的思想、观念进行提升、概括，将之充实到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中。二是基于市场经济逻辑进行的“逆向”建构。所谓“逆向”建构就是超越现实物质利益和市场经济负面因素，对世俗化利益诉求和人的自然禀赋进行规范性引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一种“逆向”建构的话语结果。

第二，基于国家与社会二元化的话语建构。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国家与社会一体化不断解体，社会不断从国家的控制下解放出来，社会自主性得到有效成长，逐步形成了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化模式。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进步的重要表现，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政治解放”向“社会解放”的推进。社会结构的变革，应当带来政治话语和意识形态的调适。执政党必须直面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变革、着眼于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化模式，推进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建构不仅仅是内容上的建构，更重要的是要思考如何有效地向社会民众传播话语，掌握话语权，实际上就是“话语作用模式”。在“总体性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作用模式是一种“控制灌输型”，主要依靠政治权力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改造”“灌输”等话语反映了这种话语作用模式的自上而下的特征。在当时，无论是“国家全面支配社会”的社会结构，还是“总体性话语”及其作用模式都是有历史合理性的，不能一概否定。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与社会二元化结构的逐步形成，国家全面支配社会的治理模式不合时宜了，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作用模式必须做出相应的自我调适。第一，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作用模式、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要更加注重运用文化—价值观机制。第二，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作用模式、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要更加注重塑造政治权威，建构行之有效的执政党和政治秩序的话语体系及其社会化模式。在政治权威的话语建构中，首先，要塑造政治权力的边界意识和法治意识，有边界的、守法的政治权力只会提升自身的权威性，而不是相反；其次，对党的领导、政治权威和国家功能的阐释与辩护，不仅仅要从“阶级”“阶级斗争”“革命与反革命”等对抗性话语获得资源，而且更多地要从实现中国现代化、社会平稳转型所需的政治秩序的角度加以说明。

■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8年第5期，原题《在双重转换中的建构——论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约10000字